

中国历史书籍目录讲义

(初稿)

第一章 概 论	1
第一节 对象与任务	1
第二节 中国历史书籍的发展阶段	2
第三节 中国历史书籍的特点	17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籍各类体裁研究及目录	26
第一节 编年体 (附国别史)	27
第二节 纪传体	37
第三节 纪事本末体	53
第四节 专史体上	57
第五节 专史体下	65
第六节 类书体	72
第七节 史评体 (附史考体)	78
第八节 史目沿革	100
第三章 古代史研究及其书目资料	106
第一节 关于通史、断代史的书籍与目录	106
第二节 关于古代专史的书籍与目录	120
第三节 关于史论体书刊与目录	132
第四节 关于新史料的书籍与目录	144

《中国历史书籍目录学》讲义

第一章 概 论

第一节 对象与任务

《中国历史书籍目录学》是以中国历史书籍及其目录为对象，研究中国历史书籍及其目录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的一门专科学。它的任务旨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学习和研究历史科学提供必须的书目资料和简捷的学习途径。

《中国历史书籍目录学》是历史科学的一门重要的辅助学科。历史科学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它的阶级性，它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二是它的科学性。总结历史规律，认识过程，预见未来，都必须严格遵守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两大特点也决定了《中国历史书籍目录学》必须为历史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革命人民学习历史知识服务，而且通过丰富的历史书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国际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从而，在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中国历史书籍目录学》的内容是由它的任务决定的。研究历史书籍是为了揭示历史书籍的内容，研究史部目录学也是为了揭示历史书籍的内容，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假如没有对历史书籍的深入研究，就不可能正确揭示它的内容；同样地，没有科学的史部目录学的原理与方法，也就不可能全面揭示历史书籍的内容。因此，《中国历史书籍目录学》不仅要介绍历史书籍严

生、发展的规律，介绍重要史籍的内容，还要介绍史部目录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以及推荐有关方面的历史书籍目录。

《中国历史书籍目录学》是为我系文科学生开设的一门专科目录学。通过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力求使同学们了解中国主要的历史书籍和资料，掌握相应的历史书目。以便将来在图书馆的工作中，能够独立地开展历史科学的书目参考工作，为历史科学的研究编制专题目录。

第二节 中国历史书籍的发展阶段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典籍。早在一千八百年前，就已经发明了造纸术，一千三百年前发明了刻版印刷，八百年前发明了活字版。我们伟大的祖国迄今已有四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我国丰富众多的史籍浩如烟海，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但它也如同别的事物一样，有着自己固有的发生、发展的规律。

中国历史书籍的发展，大体可以区分为萌芽时期、发展时期、兴盛时期、衰落时期、改良时期、革命时期等六个阶段。

一、萌芽时期（先秦）

中国历史起源很早。最初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记事”的意思。这在甲骨文的“史”字中就有明确的反映。“史”是会意字，在甲骨文中做“𠄎”，许慎《说文解字》说：《𠄎》，记事者也。从乚，持中。”“乚”是手，那末“中”是什么东西呢？吴大澂《说文古籀补》里说，“史”字“象手执简形”，“中”

是古代简策“𦰩”的简化形式。这就是说，古代史官的职责就是手执简策，记载帝王的言行。我国古代史官建置很早。据“周礼”记载，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他们还有明确的分工：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五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但是，最早的史官却不是有意的记载历史。他们的活动往往与宗教有密切关系。例如殷代的史官，即甲骨文里的所谓“贞人”，他们对征伐、田猎、农事、疾病、生育等大事都要予先占卜吉凶，然后刻结果于龟甲兽骨之上，这就是今天看到的甲骨文，亦即殷代遗留给我们的宝贵历史资料，然而，遗憾的是，文字很简单，记事不完全。

西周的文字主要是金文，因为铸在青铜器上，所以也叫青铜文。金文记载的内容比起甲骨文来要丰富的多，其中铭文最长的有五百余字。金文是殷周时代原始的历史文献记录，所以在真实性上与甲骨文有同等重要的使用价值。金文和甲骨文一样，记事简单，就事论事，片片断断，不能系统地反映一定的历史线索。

最古老的历史记载，除了甲骨文，金文以外，还反映在一些古书里。主要有《诗经》，《尚书》，《春秋》，《左传》、《国语》，《世本》，《竹书》等古籍。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创作于西周初到春秋中叶。内容包括“风”（十五国风）、“雅”（大雅和小雅，即贵族宴飨诗）、“颂”（周颂、鲁颂、商颂，即贵族庙堂诗歌）三部分，凡305篇。《诗经》虽是一部文艺作品，但其中有一部分内容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况。例如《诗·公刘》、《诗·生民》等篇反映了周朝初创的情况，从其体例上具备了人物传记的雏形。《诗经》对研究周朝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尚书》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述上起唐虞，下迄春秋的历史记事、文告和讲话。从体例上说，《尚书》主要是政治文件汇编，但有些记事非常详细，如《尚书·顾命》篇，记载了周成王病后事和康王即位的情况，叙述井然有序。《尚书》对研究周朝以前的历史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史书。春秋时期，周王朝及其诸侯国都各有自己的史书，如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以后流行的《春秋》就是孔子在鲁国史书《春秋》的基础上删订而成。该书记述了上起隐公元年，下迄哀公14年的历史记事。《春秋》一书语言简单，有些地方甚至很难看出事件的因果关系，这是它的不足之处。但它的记载，一般都有时间、地点和人物活动，比起《诗经》、《尚书》有明显的进步。《春秋》成书于公元前481年，当时古希腊的史学家、欧洲公认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只有三岁，我国古代史籍的编纂水平之高由此可见。

《左传》和《国语》均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左丘明因为《春秋》文字简约而写《左传》。《左传》记述的起迄年代与《春秋》大致相同，它列举大量的史料，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春秋时期的历史。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都有很高的价值。《国语》记载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国的历史，其中收录了各国记载的原始材料。与《春秋》相比，《左传》和《国语》的历史观点要进步得多。左丘明不像孔子那样发怀古之“幽情”，而是承认现实，承认历史的前进。左丘明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见《左传》）。他还对新兴地主阶级表示同

情。但是《左传》、《国语》也有不足之处。例如《左传》对人和神的观点前后矛盾；《国语》的年月顺序也不象《春秋》那样划一清楚。

《竹书》亦名《竹书纪年》，已散逸，残缺不全，是晋太康间汲冢人不准盗发魏安釐王墓时所得。它是记述晋国历史的编年史书，可能就是前人所谓“晋之乘”。

《世本》已失传。记载上起黄帝，下迄春秋的史事，凡十五篇。书内有：帝系，王侯，大夫，还有居篇，作篇等等。其中，以本纪记帝王，以世家记诸侯，以列传记大夫。居篇记国都，作篇记创制。从体例上看，已经具备了纪传体的雏形。《世本》对《史记》有很大影响。

综上所述，从甲骨、金文，到最古老的史书，它们是逐渐地由原始的历史记事发展为初步的编年体史书的。这个时期的史籍主要的是编年体，只是到了末期才开始出现尚不成熟的纪传体。总的说来，萌芽时期的史学著作不论就其体例，还是就其内容而言，都不能说是完整的系统的历史书籍。但是还应该看到，它们是逐渐地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着，它们为新的史籍的出现开拓了道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发展时期（汉—隋）

先秦史籍主要是编年体。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文化也日益发展繁荣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用原来那种简单的编年记事的方法来编纂史书，已不能全面反映封建国家的社会形态，于是纪传体史书很快地发展起来了。

《世本》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它对《史记》的编纂有

很大的影响。但《世本》还只能说是初步具备了纪传体规模，只是到了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问世以后，纪传体的编纂形式才进一步完善并被确定下来。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上起黄帝，下穷汉武太初，记述其时三千年历史，是一部包罗万象，通贯古今的百科全书，从体例上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一百三十篇。其中，以“本纪”记载帝王；以“表”记载历代重要世系纪年及职官更迭；以“书”记载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世家”记载王侯外戚；以“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史记》观点明确，语言生动，不仅是一部辉煌的史学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汉书》是东汉班固的名著，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上起汉高祖，下终新莽改制，凡230年历史。包括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汉书》在体例上与《史记》大体相同。所不同的仅仅两点：一是《汉书》合开“世家”入“列传”，改“书”为“志”；二是《史记》乃通史，《汉书》则是断代史。汉代所以能出现断代史，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已经形成统一而强大的国家，一个王朝需要有更全面、更详备的历史。《史记》和《汉书》问世后，对当代和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史记》、《汉书》中，“纪”和“传”在内容上占很大比重，“纪传体”即由此得名，“纪、传、表、志”的体例从此也确定下来，历代相沿，成为惯例。《史记》是纪传体的鼻祖，从《汉书》到《清史稿》全是同一体例，形成今天举世闻名的二十四史。

从汉到隋，除了最流行的纪传体史书以外，同时流行的还有编年史，起居注，故事，谱系，杂传和地方史等多种体裁的史书。

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史学家，其中既有政府的史官，又有私

家著述。他们编纂了许多种史书。例如编纂《后汉书》的就有十余家，编纂两晋史书的居然多达二十多家。这些名家在编纂过程中相互比较和竞争，编纂水平也因此明显提高。

从汉到隋这个时期的史籍在数量上的发展也是十分惊人的。从《七略》中记载的《世本》，到《汉大年纪》，著录的史书一共只有411篇，但到了隋末，发展规模已相当惊人。据《隋志》记载：这时仅史部就著录了13264卷。几百年时间，史书发展了30多倍。

三、兴盛时期（唐宋元）

唐宋元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繁荣昌盛的时期，也是我国史籍兴旺发达的时期。唐宋元所以能出现史籍的兴盛时期，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

（一）由于广大人民辛勤劳动，使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水平较前期有了更大提高，封建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唐代发明了雕版印刷，宋代又创造了活字印刷，大大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二）两晋以来，社会上严重地存在着庶族地主与士族门阀地主的斗争。士族门阀地主是“百役不及，高卧私门”的权贵阶层，他们不仅压迫农民阶级和庶族地主，同时也危及皇帝的利益。唐代以后，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推行了开科取士的封建科举制，使一些庶族地主和下层人士有机会参与国家政权和文化机构，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三）自唐代开始，政府设局官修史书。这种制度在当时虽有一定弊病，但从此以后，开始了后一朝代为前一朝代纂修史书的风气，使历史遗产得以保存和传播。这一制度的确立，也引起封建文人对史学的普遍关心，促进了史学的发展。此外，官修史书可以用

政府的名义组织各类专家和人才，用其所长，分工合作，这就大大提高了史籍的编纂水平。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唐宋元时期的史籍终于进入极盛的发展时期。史籍的空前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编纂了大批史籍。首先从“正史”方面看，居太宋时期下令纂修前朝历史，官修的史书有《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晋书》。加上李延寿私撰的《南史》和《北史》共有八部史书。宋代编纂了《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三部正史。元代在脱脱主持下编纂出《宋史》、《辽史》和《金史》三部正史。唐宋元三个王朝编出的正史共达十四部之多，占“二十四史”的二分之一还要强。从整个史部来看，这一时期的史籍数量比起前期来也有空前的发展。据《隋志》记载，隋末的时候，史部著录的史籍共有817部，13264卷，而到了宋代，据《宋志》记载，史部著录的史籍已达2147部，43190卷，史籍数量比前期猛增三倍多。

(二) 提高了编纂水平。唐宋以来的各类史籍编纂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尤其明显的是：

(1) 发展了起居注。东汉以来，唐代以前流行的起居注虽然也在不断改进，但总的说来比较原始和琐屑。唐代改革“起居注”为“实录”，实录就是在起居注基础上经过一定加工改变而来的。它在编年之内又加进简短的传记，使编年与纪传合而为一，成为有首有尾的较详尽的记事，这是实录所以取代起居注的主要原因。

(2) 发展了编年体。东汉以来，纪传体史籍盛行，编年体史籍日渐减少。这时的编年体主要用于为帝王编纂“起居注”和“实录”。唐代史官在编纂实录时，曾在编年体中又吸收了纪传和原始的纪事本末。在这种编纂形式的基础上，宋代司马光利用

自己丰富的知识，充足的史料来源和配有得力助手等有利条件，大大丰富和发展了编年体。于1084年写出了博大精深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尔后，南宋朱熹依照《春秋》、《左传》的编纂方法，于公元1172年改编《资治通鉴》为《通鉴纲目》，所谓“纲”就是依《春秋》笔法，给每一历史事件取一标题；所谓“目”就是依《左传》叙事方法阐述历史事件内容。这种方式读起来清新省目，很受欢迎，把编年体史书又推进一步。（三）出现了许多新的体裁。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体裁，主要有：（1）大型政书 社会发展至唐朝，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大型的政书出现了。唐玄宗于公元722年下诏，编纂了著名的《唐六典》，这对唐代及其以后的封建政府发生很大影响。公元803年唐代著名藏书家苏冕、苏牟兄弟编纂了第一部《唐会要》，853年唐王昶又编出《续会要》，宋代的王溥则在前会要的基础上编出更完备的《唐会要》，以后历代王朝又编了许多会要。此外，唐代史学家杜佑于803年编写书记述封建社会各种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通典》，它与宋代郑樵的《通志·二十略》，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三通”。“三通”是研究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重要参考书。（2）史评体 唐代刘知几在武周时期写出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主要的史学评论。这部杰作的著作产生于唐朝决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史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据《隋志》记载：在隋代的图书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零八卷中，仅史部书籍就占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而对这样众多的史籍，在刘知几以前从来没有人作过系统的总结和评论。刘知几第一次全面地系统地总结和评价了唐代以前的史籍，提出了著名的“史才”、“史学”、“史识”的“三长”理论，对于设馆修史的现行制度的流

弊也予以深刻揭露。刘知已的《史通》为史学评论开创了道路，对史学发展有很大影响。(3)纪事本末体 宋代袁枢是纪事本末体的首创者。袁枢喜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但“苦其浩博”，于是他将《通鉴》材料“区别门目，以类排纂”（见《四库提要》），编成239个有头有尾简明扼要的纪事。这就是著名的《通鉴纪事本末》。章学诚评价纪事本末体“又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这是袁枢对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继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问世后，纪事本末体书籍很快发展起来。

综上所述，社会发展至唐、宋、元朝的时候，中国的史籍进入兴旺的时期。

四、衰落时期（明清）

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除了用武力屠杀人民的反抗之外，还实行了文化专制主义，建立了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大批杀戮文人，摧残文化，我国史籍从此由盛转衰，开始走向下坡路。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微贱”。既怕武将造反，又怕文人不顺。他刚即位不久，就兴起“胡党”、“兰党”大狱，把功臣武将几乎杀光，同时又向文人学士开了杀戒。文字中稍有涉嫌之处，即有杀身之祸。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人做万寿贺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语，朱元璋认为“作则”就是“作贼”，逐杀赵。杭州教授徐一夔在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句，朱元璋阅后怒不可遏，他居然认为“生”、“光”是隐刺他当年出家当和尚，遂即捕杀徐氏。洪武十八年，又颁布大诰十条，作为学校、私塾必读课本，其中一条是：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抄家）劓（杀头）。明成祖以后，变本加厉，设立了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特务机构，专门侦探捕人，对全国舆论控制

更严。在明代，许多文人不敢冒险做官，一经做官无异入狱。

满清王朝更加残忍。满族本是人口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为了征服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先进，并具有反抗精神的汉族人民和其他民族的人民，清朝实行了反革命的两手：一方面大肆宣扬反动的程朱理学和封建道德，竭力发展桎梏青年思想的“八股科举”，一方面严禁反映现实的野史和杂史，兴起遍布全国的文字狱，实行“留发不留头”的文化政策。康熙二年的庄廷钰案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庄廷钰，浙江吴兴人，曾撰写过指斥清人的《明史》。以后被革职的县官吴之荣告发，庄氏家族无一人幸免：十六岁以上男子一律处斩，女子充边远为奴。为《明史》作序、参校、刻印者、买卖《明史》者，甚至包括当地地方官在内，全部遭到株连，七十余人被杀害。庄廷钰当时早死，被清政府剖棺戮尸。康熙五十三年，政府下令“所有小说淫词，应严禁、销毁”：“违反者治罪，印刻者杖流，市卖者杖徒”。雍正时期，愈演愈烈。如雍正五年，江西正考官查嗣庭出了“维民所止”的试题，被人告发，说是“维止”是取“雍正”斩首之意，当查嗣庭被害死狱中之后，雍正又命剖尸枭首。又因查嗣庭籍贯浙江人，遂停止浙江的乡试、会试。又如某日雍正微服游书市，微风吹来，书页翻动不已，一士人吟道：“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雍正以为讽刺自己，怒杀士人。康、雍、乾是清代的所谓“盛世”，而正是这个“盛世”，文字狱迭起，被无辜害死者不计其数。

在明清两代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下，文人学士明哲保身，遂致力于古代的考据，他们人人自危，不敢触及社会现实，这是明清时期史籍衰微的主要原因。

明清史籍衰落表现在许多方面。

(一) 前代史和本朝史的纂修数量少。对于前代历史的纂修，明代只有一部《元史》，清代也只有一部《明史》。柯劭忞用四十年心力编纂的《新元史》虽从清末开始编纂，但直到民国十一年才成书，所以不能算作清代成绩。至于对本朝历史的编纂，明清两代就更谈不上了。它们都是仅仅编出了实录，没有编成国史。

(二) 史籍的体裁少。在史籍极盛的居宋元时期，史籍的体裁丰富多采。但明清时期，许多史籍都是因循守旧和“续修”，在体裁上没有什么新的创造。例如专详文化史的《九通》，其中的“前三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分别为史籍兴盛时期的唐代杜佑，宋代郑樵、元代马端临所作，“后六通”（《续通典》、《清朝通典》、《续通志》、《清朝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皆是清朝乾隆时期敕修的，从体例上完全是照搬照抄，从内容上多相重复，实在有些累赘之感。

(三) 有些重要史籍的质量很差。一部“二十四史”，《元史》是最差的史籍之一。洪武二年（1069年）朱明王朝刚刚攻下元都，就命宋濂等人仅仅依据元朝的“十三朝实录”纂修《元史》。《元史》记载了从成吉思汗元年（公元1206年）到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凡一百六十余年历史，但是朱明王朝两次开局纂修（洪武二年二月到八月，洪武三年二月到七月），总共只用一年时间即完成《元史》二百一十卷。由于《元史》草草成书，因此没有来得及采集“实录”以外的其它珍贵资料（如《元朝秘史》等），加之缺乏剪裁和考订，致使错误，遗漏及重复之处，比比皆是。无怪后人评论说：“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简陋，亦无如元史者。”（见范文澜《正史考略·元史》）

当然，清代纂修的《明史》质量是较好的，清代的考据学是空前发展的，但从史籍发展的整个趋势看，明清两代不能说不不是趋于衰落时期。

五、改良时期（1840—1919）

1840—1919年是我国历史上的近代时期，它虽然只有八十年时间，却在我国历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个时期，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在国内激起了空前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由于满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在国际上招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和瓜分，民族矛盾日趋加剧。清政府内外交困，社会黑暗到了极点，国家积弱到了极点！中国正在一步步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在这种形势下，一向讲究考证的乾嘉学风开始烟消云散，代之而起的是主张学习西方、改革现状以求富强的功利主义。这条路线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路线。在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已陆续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外国资产阶级不仅在国内残酷剥削工人阶级，还在全世界划分势力范围，掠夺殖民地，以保障其廉价的原料、劳动力和商品销售市场。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要走西方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资产阶级改良时期的史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始研究本朝掌故。清代“乾嘉学风”是主张征实，不尚空谈的，可是说到底，它还是不敢触及社会现实，还是为学问而治学问的学风。这种学风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与冷酷的社会现实早已经格格不入了，于是一些进步人士开始了对本朝掌故的研究。魏源是近代时期学以致用、学以致用的进步学者。他痛恨“士大夫不讨掌故，

道听途说。其究至于贻误国家”，他亲身感到鸦片战争的威胁和《南京条约》的耻辱，于1842年写出《圣武记》十四卷，书中上起清初，下迄嘉庆，盛陈清初武功，推断国运盛衰和用兵成败的道理。对于研究本朝掌故发生很大影响。夏燮在魏源思想影响下，于1865年写出《中西纪事》二十四卷，反映了1840—1858年的历史，愤怒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该书托名江上蹇叟。还有研究本朝名人传记的。如李元渡的《国朝先正事略》六十卷，是一部简明的传记集。

(二)开始研究边疆史地。边疆史地学，主要指西北史地学，它本来只是十八世纪末一个很小的学派，后来由于外国帝国主义从陆地上入侵中国大都从西北来，引起知识分子关注，于是边疆史地学日益发展起来。研究边疆史地学较有名的有：洪钧博采四方史籍写成的《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屠寄的《蒙兀儿史记》。何劭志是改编《元史》的集大成者，他著有《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此外，有徐松的《西域水道记》五卷，《新疆识略》十二卷，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十六卷，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八卷等。

(三)开始研究外国史地。1840年外国的兵舰和大炮打开了清朝大门，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形成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局势，于是研究外国史地的风气日渐兴盛起来。在此方面，较有影响的有：魏源的《海国图志》100卷，这是十九世纪最为流行的一部外国史著作，他写书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他看来，要“制夷”首先要“师夷”，即学习西方资本主义。1848年徐继畲还写出《瀛环志略》10卷，体例与《海国图志》相同，内容一般先图后说，非常简洁。当时除了国内著述以外，还翻译了大